

# 数字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及其实现

王维红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数字时代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重塑大学知识生产范式，使其从封闭形态转向开放的新阶段，释放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量化评价导致的创新内卷、基础研究边缘化、技术滥用等，这些侵蚀着大学知识生产的伦理根基与公共价值。数字时代大学知识生产实现德性转向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以协同共生价值引领知识生产革新，以伦理约束护航知识生产价值归位，以有为实践筑牢知识生产价值根基。

**关键词：**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德性转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 (2026) 03-0133-08

**收稿日期：**2026-02-21

**作者简介：**王维红(1999-), 男, 河北石家庄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3.012

当大数据的浪潮漫过大学知识生产的传统岸线，当人工智能的算法重塑大学知识创造的底层架构，数字技术正以强劲态势改写着大学知识生产的范式。从学术殿堂的深耕细研到跨校跨界的协同创新，大学知识生产也已然告别工业时代“精英垄断、学科壁垒”的封闭形态，迈入“多元参与、技术赋能”的开放新阶段。这无疑释放了磅礴的创造活力，让学术成果流通挣脱时空束缚，使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技术赋能的光鲜背后，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正悄然侵蚀着大学知识生产的伦理根基。“唯论文、唯专利”的量化崇拜异化为科研创新的枷锁，让学术探索陷入内卷化境地；数据滥用与隐私泄露的乱象冲击学术伦理边界，触碰法律红线；AI 工具滥用削弱原创能力，让大学知识生产面临“有技术无伦理、有效益无责任”的困境。回望历史长河，大学知识生产历经轴心时代、权威时代、大机器工业时代，如今正迈入数字时代的新阶段。这呼唤我们超越工具理性的单一逻辑，对大学知识生产重新审视。因此，在数字技术重塑一切的当下，探索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实则是在技术浪潮中为知识生产锚定价值坐标，让知识生产始终沿着合乎人性、顺应时代的方向发展，为数字文明注入温暖的人文底蕴与鲜活的精神灵魂。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传统大学知识生产的特征与局限

知识生产作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重要职能，以学术论文、专利成果、基础理论突破、应用技术研发为主要形态，兼具“探求真知”的学术属性与“服务社会”的公共属性，是传承文明、推动创新的重要方式。回望发展历程，传统大学知识生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数字时代的技术浪潮中，逐渐暴露出与时代发展不相适配的局限。

从主体构成来看，传统大学知识生产呈现出学术共同体生产的封闭特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高校科研人员作为主体，依托学术机构的资源优势与学科积淀开展知识创造，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圈层。以精英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在确保知识生产的专业性与严谨性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开展系统性、深层性的学术探索。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一封闭特征的局限愈发凸显。一方面，学术圈层的壁垒阻碍了多元主体的参与，行业机构、社会力量、公众群体等潜在的创新主体被排除在外，导致知识生产的视角单一、资源整合不足，难以回应复杂社会问题对跨领域、跨学科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封闭的创造群体使得知识生产的责任体系相对固化，缺乏多元监督与协同治理的机制，为伦理失范问题提供了空间。

在技术应用层面，传统大学知识生产以经验驱动、人工操作为主要特征，技术手段相对单一且滞后。

在数据采集阶段,依赖人工调研、文献梳理等传统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存在数据覆盖面窄、准确性难以保障等问题;在研究分析阶段,缺乏高效的计算工具与建模方法,复杂问题的研究往往受限于人力与技术条件,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实证分析与深度探索;在成果传播阶段,主要依赖学术期刊、专著出版等传统渠道,传播范围有限、周期漫长,导致知识成果的转化效率不高,难以快速服务于社会发展。进入数字时代后,大数据、AI 科研工具、区块链等现代技术虽已深度嵌入知识生产全流程,大幅提升了研究效率与成果转化速度,但传统技术应用模式带来的路径依赖并未彻底消除。部分科研人员对数字工具的应用停留在表层,缺乏对技术原理与伦理风险的认知,过度依赖工具辅助弱化了独立思考与原创能力。并且,技术与学术研究的融合不够深入,数字技术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反而因技术滥用、数据误用等问题引发了新的风险隐患,凸显了传统技术应用方式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不足。

在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方面,传统大学知识生产长期受工具理性主导,形成了“重量化、轻质效”“重实用、轻人文”的特征。工业时代以来,工具理性所倡导的效率最大化、结果最优化逻辑逐渐渗透到知识生产领域,推动了知识与技术的快速发展,但也催生了功利化的价值导向。在评价体系上,学术评价逐渐向论文影响因子、专利转化率、项目经费额度等可量化指标倾斜,“唯论文、唯专利、唯经费”的导向日益固化。这种评价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曾起到激励科研人员、规范学术秩序的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局限愈发突出。一是导致创新内卷化,科研人员为追求短期可见的量化成果,纷纷聚焦“短平快”课题,刻意避开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的基础理论与人文社科领域,使得低水平重复研究增多,真正具有突破性、原创性的成果难以涌现;二是忽视知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滋养、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引领等内在价值,而这本质上正是资本逻辑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对学术价值理性的侵蚀<sup>①</sup>;三是加剧了学术失范行为,部分科研人员为迎合量化评价标准,不惜采取数据造假、论文代写、专利拼凑等违规手段,触碰学术伦理与法律红线,严重损害了学术的严肃性与公信力。

从知识传播与转化来看,传统大学知识生产呈现“重产出、轻传播”“重学术、轻应用”的特征。在传播层面,知识成果主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流通,传播渠道相对封闭,公众难以便捷获取优质知识资源,导致知识的公共价值未能充分彰显;在转化层面,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较为突出,高校科研成果往往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与产业需求、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成果转化率偏低,难以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进入数字时代后,虽然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知识的可及性显著提升,但传统模式下“重产出、轻传播”“重学术、轻应用”的思维定式依然存在。部分科研人员缺乏传播意识与转化能力,优质知识成果难以通过有效渠道触达公众与应用场景。同时,知识传播中的内容筛选与价值引导不足,虚假知识、劣质知识趁机蔓延,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扰乱了正常的知识生态,进一步凸显了传统知识传播与转化模式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缺陷。

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是传统大学知识生产的局限所在。工具理性将知识、技术等一切要素均视为实现特定功利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在知识生产领域,其异化表现为片面凸显知识的经济价值与实用功能,忽视了知识的人文价值与公共属性,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学术价值理性的侵蚀。而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德性伦理,以个体内在德性培育为核心,主张通过塑造善良品格、唤醒道德自觉、强化责任意识,引导行为主体主动做出合乎善的价值选择,恰能弥补工具理性的缺陷。德性伦理更关注“成为什么样的人”,致力于将道德要求内化为主体的价值信念与行为习惯,在知识生产中,要求知识生产者涵养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怀敬畏的责任意识、关爱他人与自然的人文情怀,为知识生产的伦理正当性筑牢根基。

## (二)理论与模型

1.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的两大范式,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传统道德哲学的思想进路是关注行为的外在规则,这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伦理。规范伦理认为只有制定一套合理的行为规范,才能够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限制在正义

---

<sup>①</sup>李丽丽:《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僭越——从〈启蒙辩证法〉看“学术资本主义”》,《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6期。

范围内<sup>①</sup>，它是表达现代理性主义的客观知识化和普遍同质化的价值诉求<sup>②</sup>。可以说，规范伦理侧重通过制定外在的行为规则、制度规范，明确行为的正当边界，为知识生产提供可操作的伦理准则与问责机制，解决“行为合规”的问题。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西方伦理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形成了一个德性传统，即追求道德完善与至善之境，只是这个德性传统后来逐步被规范伦理所消解<sup>③</sup>。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强调公共的善或社群的公共利益，强调个体的生活整体，强调内在的善和美<sup>④</sup>，从这一角度来看，与侧重外在规则约束、聚焦“应当如何行为”的规范伦理不同，德性伦理更关注“成为什么样的人”，致力于将道德要求内化为主体的价值信念与行为习惯，注重道德主体的品质在道德活动中的优先性，更加突出“以行为者为中心”<sup>⑤</sup>。其解决的是“动机向善”的问题。综合二者来看，有效的伦理约束需要“外在规则”与“内在自觉”双重保障。缺乏规范伦理的德性伦理易陷入主观随意性，缺乏德性伦理的规范伦理易导致“形式合规而实质失德”。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辩证统一的。

2.知识生产“自我—自然”演进模型。该模型借鉴于学者张国昌(如图1所示)，他从“自我认知”与“自然开发”两个维度，将知识生产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象限。其中，“自我认知”体现为主体的反思性、批判性与主体性觉醒程度；“自然开发”体现为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该模型认为，知识生产的演进本质是自我认知不断提升、自然开发不断深化<sup>⑥</sup>的一个协同过程：从轴心时代“重自我、轻自然”，到权威时代“自我与自然双弱”，再到工业时代“重自然、轻自我”，最终迈向数字时代“自我与自然并重”的第一象限。这为理解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参照，也显示出德性转向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应对自我与自然失衡、实现阶段跨越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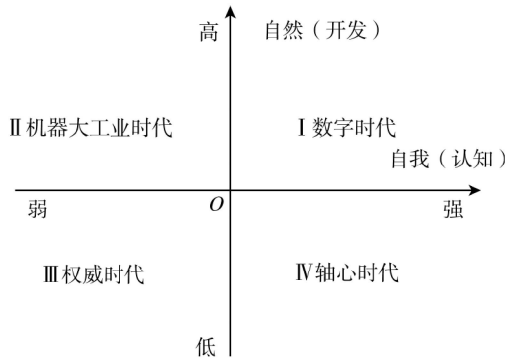


图1 知识生产的“自我—自然”象限分布图

相较于传统按技术形态(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数字时代)划分知识生产阶段的理论，“自我—自然”模型的特点在于，既关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知识的工具价值)，也重视主体的反思性与道德自觉(知识的人文价值)，能够较为准确揭示数字时代知识生产伦理失范的根源即由于工业时代“重自然开发、轻自我认知”的路径依赖，导致工具理性压倒人文理性。这为分析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 二、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德性转向的时代价值

数字时代的技术浪潮为大学知识生产注入强劲动能，但也催生了一系列突出问题，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在量化崇拜的影响下，“唯论文、唯专利、唯经费”的评价导向使得不少科研人员为追求短期可

①魏则胜：《在德性与规范之间》，《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②吕耀怀：《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及其关联》，《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③张国昌：《知识生产的历史演变与德性转向》，《高等理科教育》2025年第3期。  
④寇东亮：《“德性伦理”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⑤张政江：《朱熹仁学德性思想研究——基于〈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的分析》，太原：山西大学，2022年。  
⑥张国昌：《知识生产的历史演变与德性转向》，《高等理科教育》2025年第3期。

见的量化成果,纷纷聚焦“短平快”课题,刻意避开周期长、难度大的基础理论与人文社科领域,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增多,有学者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知识生产可能弱化人类作为主体的创造性、自主性,消解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影响数据基本价值<sup>①</sup>。部分科研人员未经授权采集个人隐私数据用于研究,甚至存在数据造假等问题,既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触碰了法律与学术伦理的红线。生成式 AI 代写论文、伪造实验数据、批量产出“灌水成果”等滥用行为,大大削弱科研人员的原创能力与责任意识,消解着学术成果的真实性与严肃性。

这些问题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并非主观构想,而是必然选择。从问题本质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技术缺陷或制度漏洞,而是学术德性缺失导致的动机失范即求真精神弱化、责任意识淡薄,唯有通过德性培育才能从根源破解。从现有治理局限来看,仅靠查重机制、数据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只能如“治标”一般约束显性失范行为,却难以管控刻意规避查重、为量化指标牺牲研究质量等隐性失德,亟需德性伦理补充内在自觉的重要一环。从大学使命来看,育人与服务社会是大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职能,重视德性恰能避免大学沦为量化成果工厂,确保学术成果兼具技术价值又有人文温度。

#### (一)破解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化困境

工具理性在知识生产中呈现异质性的功利化形态。学术科研领域表现为唯论文影响因子、唯专利转化率的量化崇拜,导致基础研究被边缘化、低水平成果内卷;平台知识生产表现为流量至上的逐利导向,催生虚假知识与隐私数据滥用;AI 知识生产表现为“效率优先”的技术逻辑,忽视内容真实性与算法公平性。三者本质均是工具价值凌驾于人文价值,机器大工业时代形成的工具理性思维,并未随数字时代的浪潮消退,反而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更深层次地渗透到知识生产的肌理之中,催生了“唯论文、唯专利、唯效益”的功利化迷局。在效率至上的主导下,数字技术进一步放大了知识的资本属性,使其流通性与可交换性逐渐凌驾于真理探索、人文滋养的价值之上,成为衡量知识优劣的主导标尺。论文发表的期刊层级、数量指标,专利的申请通过率与市场转化率,科研项目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等量化数据,逐步取代了知识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科研机构考核评估、人才选拔任用、资源分配倾斜的主要依据。知识生产者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不得不将这些量化指标奉为首要目标,原本纯粹的学术探索、知识创造,逐渐异化为满足指标考核的工具性活动,知识应有的精神价值在功利追逐中不断被消解。单一化的价值导向让知识生产陷入了严重的内卷。从学术治理内卷化来看,以“复制出越来越多的低水平的学术成果为代价”,必然会引发“措施加强与成效不彰之间的恶性循环”<sup>②</sup>。在僵化的评价体系裹挟下,科研人员纷纷避开周期漫长、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产出成果的研究方向,转而聚焦于短期见效、易出成果的“短平快”课题。那些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学科研究,那些滋养精神世界、维系社会文明根基的人文社科研究,因缺乏直接经济效益和快速量化的现实可能,逐渐被边缘化,面临着资源投入不足、优秀人才流失的严峻挑战。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知识成果可能会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些技术被滥用 in 投机炒作、流量变现等逐利领域,完全背离了知识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本质初衷。当知识生产彻底向功利主义倾斜,创新活力便会陷入枯竭,而真正的科学突破、知识革新,往往源于无功利心的自由探索。

#### (二)契合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知识生产的终极价值旨归,这决定了知识生产既要成为撬动社会进步的物质杠杆,更要担当滋养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化使命。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导致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失衡,智育的单向度发展带来诸多问题,“智育至上”的知识教学强化了一种注定被机器智能淘汰的能力,其对知识本身规定性的僭妄使知识与德性相疏远<sup>③</sup>。自工业时代以来,知识的工具属性被无限放大,

① 姜超、申文君:《数据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实践机理与法治机制——以 ChatGPT 为例》,《情报资料工作》2024 年第 4 期。

② 朱文辉:《学术治理的内卷化:内涵表征、生成机理与破解之道》,《高等教育研究》2020 年第 6 期。

③ 鲁子箫:《知识的智育困境与德性本质——面向智能时代的思考》,《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 12 期。



“知识就是力量”的经典认知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催化下，异化为“知识就是效益”的功利性执念。知识生产的重心长期聚焦于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却在无形中弱化了对人的精神世界、道德品格的滋养。数字技术的普及虽在形式上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但其作用更多停留在技术操作熟练度与生产效率的表层，未能触及精神自由与人格完善的深层需求。部分知识生产者在技术规则与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沦为技术理性的附庸，丧失了对知识本质的反思精神与应有的道德自觉；普通民众则在海量碎片化、娱乐化知识的冲击下，难以获得系统性的精神滋养与价值引领，导致自我认知趋于片面，精神世界愈发贫瘠。

知识生产的价值在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知识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推动社会发展、提升生产效率的工具性价值固然重要，但唤醒个体理性、培育道德品格、激发创造精神的人文性价值，更彰显知识的温度与灵魂。当知识生产片面追求工具价值，不仅会让知识失去厚重的人文底蕴，更会导致个体发展的畸形化：要么成为只重效率的“技术机器”，要么沦为缺乏深度的“碎片化个体”。

### （三）回应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伦理挑战

现代社会，数字技术加速迭代，这既为知识生产开辟了跨界融合、即时共创的全新赛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能，也催生了一系列突破传统伦理边界的新课题，对知识生产的伦理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生产要素来看，数据已成为数字时代知识创造的源头活水，但数据治理的伦理失序问题正持续冲击知识生产的正当性根基。部分机构漠视个体权益，未经授权擅自采集、存储甚至交易个人隐私数据，或将其作为科研攻关的“免费原料”、商业变现的“流量密码”，既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消解了知识生产应有的伦理敬畏。更甚者，在算法主导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算法偏见引发了知识歧视风险。有学者研究指出，算法偏见的有关研究多止步于技术伦理层面的思辨探讨，对算法价值判断的逻辑及后果的经验性研究仍然存在不足，而其本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sup>①</sup>。算法模型所依托的历史数据，往往沉淀着既有社会的价值偏向，经技术放大后，生成的知识内容极易固化甚至强化性别、职业、地域等领域的刻板印象，让知识沦为加剧社会撕裂的“隐形推手”，从而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从传播生态来看，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打破了传统知识生产的精英垄断格局，让“人人皆可创造知识”成为现实，但也为劣质知识、虚假知识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一些缺乏事实依据、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借助算法推荐的传播优势肆意扩散，不仅误导公众认知、混淆是非边界，更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挑战着知识应有的真理属性与公共价值。从伦理层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全新的伦理困境。知识产权归属界定模糊、内容真实性验证难度加大、技术滥用的责任划分不清，传统伦理规范与治理模式在这些新问题面前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与引导。

追根溯源，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的伦理困局，并非技术发展的产物，而是机器大工业时代工具理性的惯性延续即过度追求效率与利润最大化，忽视人的价值与伦理底线，最终在数字场境中的投射。学术研究范式正从工业化时代的客观性主导，转变为信息化时代的透明性主导<sup>②</sup>，而工业文明建立的“效率至上”评价标准与数字文明的人文需求存在根本冲突，这种标准错位正是伦理失序的重要原因。尽管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伦理挑战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但核心症结始终在于技术发展与人文价值的失衡、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割裂。因此，破解这一困局，必须跳出“技术至上”的认知迷思，让知识生产在人、自然、社会等多重价值维度上彰显时代使命与人文温度。

## 三、数字时代大学知识生产德性转向的实现路径

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重自然、轻自我”，迈向数字时代“自我与自然并重”的新阶段，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清晰昭示：知识生产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不断深化，也伴随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

---

<sup>①</sup>塔娜、林聪：《点击搜索之前：针对搜索引擎自动补全算法偏见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8期。

<sup>②</sup>李飞跃：《数字时代人文研究的范式跃迁》，《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3期。

探索。推动知识生产实现德性转向,绝非仅仅悬浮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探讨,而是要将人文精神、道德底蕴与责任担当深度融入知识创造、传播、转化的全流程,让知识生产沿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

### (一)以协同共生价值引领知识生产革新

价值取向革新是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实现价值重塑的逻辑起点。这需要打破工具理性主导的桎梏,构建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协同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让知识生产更好彰显时代使命与人文温度。

在入学维度,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知识生产的终极旨归。摒弃“技术至上”的片面认知,既要发挥知识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工具价值,更要凸显知识本身滋养精神世界、培育健全人格的人文价值。人工智能的终极意义在于扩展而不是替代人类价值,人的价值是不可能被替代的,AI始终只能是人的工具和助手<sup>①</sup>。在人文社科领域,应深耕人的生存意义、情感共鸣与价值追求,以思想之光照亮个体精神成长之路;在自然科学领域,需将人文关怀融入创新实践,让技术知识始终成为解放人、发展人而非异化人的力量,避免技术理性压倒人文理性,使每一项知识成果都能为个体理性觉醒、道德淬炼提供养分。

在自然维度,需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观,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嵌入知识生产的内核。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视创新,拒绝各类危害自然永续发展的知识成果。引导知识生产聚焦绿色低碳技术、生态保护模式、可持续发展创新等议题,着重关注新能源利用、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知识成果产出,推动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与守护修复实现动态平衡,让知识成为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

在社会维度,需强化公共利益导向,凸显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引导知识生产主动回应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公平正义、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时代课题,聚焦社会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让知识成果更好服务于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坚决抵制知识的资本垄断与私人滥用,防范知识沦为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坚守知识的公共属性。

### (二)以伦理约束护航知识生产价值归位

构建科学有效的伦理约束体系,是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实现价值重塑的重要手段。这需要突破重外在规则轻内在自觉或重道德感召轻制度约束的片面认知,打造人文涵养与规范约束相辅相成、协同发力的保障机制,让知识生产在伦理轨道上行稳致远。

在伦理素养层面。培育内在德性是伦理约束的重点所在,唯有将道德自觉内化为知识生产者的精神底色与行为习惯,才能从根本上守护知识生产的伦理正当性。要以教育引导为切入点,把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怀敬畏的责任意识、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并且,推动建设有利于科学研究的伦理文化,既要致力于解决基本科学问题,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也要致力于澄清和解决科研中的伦理问题,通过伦理规范让科学家成为有伦理意识的科学家,使科学成为负责任的科学<sup>②</sup>。

在课程建设方面。应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增设科研伦理、科技伦理等课程,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让青年学者在学术起步阶段就树立起坚定的伦理信念。在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中,强化伦理素养的常态化培育,引导科研人员在学术生涯中持续涵养德性修为。依托学术共同体的文化引领作用,搭建伦理交流平台,开展典型案例研讨,弘扬崇尚真理、坚守底线的学术风尚,让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业共识,让伦理自觉成为职业本能,使知识生产者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践行为真而研、为善而创的价值追求。

在制度约束方面。外在制度是伦理约束的重要保障,唯有以明确的规则划定行为边界,才能为知识生产提供可操作、可问责的行为遵循。针对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数据化、算法化特征,精准施策完善制度设

---

<sup>①</sup>《从“数据化”到“数字化”:社会科学范式转型呼唤人文价值回归》,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3月24日,[https://www.cssn.cn/shx/shx\\_sxk/202503/t20250324\\_5859707.shtml](https://www.cssn.cn/shx/shx_sxk/202503/t20250324_5859707.shtml),2025年12月16日。

<sup>②</sup>李伦:《科研伦理:科学研究的道德基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11期。

计。在数据治理中,制定覆盖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全流程的伦理规范,明确数据隐私保护的红线,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边界,防范数据滥用与隐私泄露;在算法应用中,建立算法公平性审查机制与透明度评估体系,加强对算法设计、模型训练、结果输出的全链条监管,破解数据偏见引发的知识歧视问题;在知识传播中,压实数字平台的主体责任,制定知识内容审核与传播的伦理准则,健全虚假知识、劣质知识的识别与过滤机制,净化知识传播生态。

### (三)以有为实践筑牢知识生产价值根基

实现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终究要落脚于实践,需以技术赋能为支撑、多元协同为纽带,将价值理念与伦理规范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实践路径,推动大学知识生产在创新创造中坚守人文底色、彰显责任担当。

在科学技术层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核心驱动力,更是守护知识生产伦理的重要支撑。要善用数字技术的正向效能,为知识生产的价值导向筑牢技术屏障。第一,面对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伦理的挑战,需要重新调试知识生产的凝视重点,不仅关注知识内容、源头、生产、分发的治理,更要治理前置,强化对生产者(大模型)、语料及技术的把关<sup>①</sup>。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全流程伦理监测体系,对知识生产中的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环节进行动态追踪,精准识别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伦理风险,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第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智能化伦理审查工具,对算法设计的公平性、知识成果的合规性开展自动化评估,既提升伦理审查的效率与精准度,又破解传统审查模式中主观判断偏差等难题。第三,搭建开放包容的数字化交流平台,打破学术共同体的圈层壁垒,让公众能够深度参与知识生产的议题设定、伦理研讨等过程,让知识生产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中保持公共性与公正性,使每一项知识成果都能充分反映社会诉求、回应公众期待。

在主体协同层面。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实践离不开多元主体协同发力,需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第一,知识生产者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要将伦理自觉内化为职业素养,在选题立项时坚守价值导向,在研究实施中恪守学术规范,在成果转化中兼顾社会效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知识创作始终行走在道德轨道上。第二,学术共同体应发挥引领作用,制定行业伦理公约,开展典型案例研讨,推动伦理规范内化为行业共识,以良好学术生态滋养科研人员的德性修为。第三,政府要强化监管责任,完善伦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明确知识生产各环节的权利边界与责任划分,为伦理实践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第四,公众需提升媒介素养与伦理意识,理性参与社会重要议题讨论,对失德行为敢于发声、勇于监督,形成“生产者自律、共同体引领、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总而言之,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引擎,良性的知识生产则关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进步。从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单向发展,到“人—自然—社会”协同共生的价值重构,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彰显着人类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与自觉践行,承载着时代发展赋予的重大使命。因此,推动知识生产实现德性转向,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贯穿价值引领、伦理约束、实践落地的系统性变革,唯有坚持协同共生价值,才能让知识生产饱含人文温度、蕴含生态情怀;坚持科学有效的伦理约束,才能让知识生产在规范有序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坚持多元协同的有为实践,才能让价值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效。

## 结 语

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不是对既有生产模式的简单修正,而是一场价值重塑与实践革新。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知识生产的效率推向新高度,当“人人皆可创造知识”的民主化图景逐渐显现,我们更需清醒认识到:技术突破的范围越是广阔,伦理坚守的底线就越需清晰。知识传播的效率越是提升,价值引领的责任就越显重大。

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其深层意义在于它为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注入了反思性与责任感,让技术发展

---

<sup>①</sup>曾白凌:《大模型、大数据、新精英:数字技术对知识生产的征服与全球性重构》,《现代出版》2023年第6期。

始终应锚定人的全面发展。今天，算法主导的知识生产日益普及、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料，“德性”不应只是悬浮于实践之上的道德说教，而是应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尺。通过伦理规范与德性培育，为技术赋能划定合理边界，让知识生产在效率与价值、创新与伦理之间实现平衡，避免技术异化带来文明风险，推动数字文明朝着更具温度、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深入推进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德性转向既是摆脱当下伦理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面向未来文明发展的长远谋划。当每一项知识成果都蕴含着对人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对自然的敬畏，当知识真正成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守护地球安全的力量，数字时代的知识文明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厚的精神动力，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

## **The Virtue Turn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ts Realization**

WANG Wei-ho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reshaping the paradigm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itioning it from a closed form to an open new phase and unleashing robust innovation vitality.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triggered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innovation involution caused b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arginaliz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abuse, eroding the ethical foundation and public value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Achieving a virtuous tur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during the digital era can be approach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guid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novation with the value of symbiotic collaboration, safegua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value through ethical constraints, and solidifying the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value through proactive practice.

**Keywords:** digital age; knowledge production; virtue turn

[责任编辑 治平]